

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78 期・頁 207-212・2013

DOI:10.6152/jaa.2013.06.0011

回應與反響

黃應貴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非常謝謝上述幾位評論者願意從他們專長的幾個不同角度與視野來討論這本書。在還沒回應個別問題前，有一個基本立場必須先說明：這本書雖牽涉許多不同理論概念及多層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卻是以人類學民族誌為主要探討方式。因此我不只著重多層面現象的整體性及當地人的文化主觀觀點，更透過歷史過程的比較與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圖像的對照來進行論述。由於評論者提問相當歧異，宥於篇幅，不可能一一作答，底下擬將評論者所提問題整合成幾個主要問題來回答。

首先，擅長馬克思理論但以經驗論方式研究的謝國雄先生，提到「第二卷關注的焦點是柬埔寨整體社會的分析，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進展」，其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並未直接探討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即勞資範疇的分化與浮現，以及勞資之間的生產關係」。然而實際上，我關心的不只是社會的整體分析，也涉及當地人如何理解外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及如何建構他們的「經濟」範疇與反應方式。正如過去人類學民族誌所示，除了工廠或拉丁美洲大農莊之類明顯有資本與勞力分化、對立之地區以外，當地人對外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解，大都是由市場交易與機制切入，就如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一樣。換言之，如何理解資本主義，即使在學界也因理論立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切入點與解釋，正如同馬克思理論者會否定商業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然而許多地方社會的人群之立場更接近資本主義經濟學，不會從勞資範疇的分化與浮現著手，而是從市場機制的理解開始。更何況，在地方社會中，因資本主義化程度的條件及文化主觀理解上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認識與反應方式，因而有不同實踐資本主義經濟的路徑與面貌。

同樣地，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確實展現不同的面貌。在台灣，因新自由主義化最重要的時期（指陳水扁總統執政時的金融改革及政府改造）屬於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而乏人問津，以致於我們至今仍無法有效掌握其宏觀面貌，甚至出現了否定新自由主義化現象已然存在的保守趨勢。然而柬埔寨當地人卻清楚地認識到這外在條件或環境的改變力量，雖然他們並不會使用「新自由主義」一詞來指稱此一結構力量。由於當地人對於這

結構力量之理解仍有相當大的歧異，我只好權宜地使用一個較為廣泛的名詞來指稱，但一定包含資本或資本家及市場的力量。對當地人來說，新資本的不斷進入不僅造成地方社會的不斷再結構，資本家或財團更主宰整個地區的國土規劃，只差沒說資本家或財團治國而已。是以，內部派系的鬥爭，不只是顯示外力在聚落的能動性而已，背後更是資本家或財團的力量。以書中述及兩派爭議最久而有關拉樂樂谷溫泉水到東埔社使用的案由為例，一派希望與溫泉區開旅館業背後的漢人資本家合作，以便能快速取得合法用水權。但另一派卻堅持溫泉水僅能由原住民使用，並批判對方圖利財團。但反資本家者背後就沒有財團撐腰？當然不是，只是另一派資本家而已。這也為何當地兩派以外者均對政治冷淡。換言之，當地人早已看穿了這個國家已是由資本家所宰制，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兩者相輔相成或相互約制。好像只有學院中的學者及政府官員還相信國家是萬能的。這也已涉及吳叡人所提及的問題。

政治學者兼社會實踐者的吳叡人先生，提了許多涉及社會實踐的相關問題，是我目前難以回答的，但其中有一個問題與我書中的討論有關，即現代民族國家存在的問題。他當然質疑新自由主義國家這頭巨靈，卻認為「在當代條件下人類社會之國家化已經是一個難以逆轉的現實」，而解決之道在於冀望具有深化民主作用與力量的「公民社會」發揮作用，並視之為「後國家社會內部的一種無政府驅力」。顯然，他假設在當代，國家仍是必要之惡。但我有不同的看法。正如當地人的見解，國家不僅不斷地演變，而且還不斷地弱化。這點，馬克思歷史學家 E. J. Hobsbawm 說得很清楚：「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在未來將扮演被支配的乃至於瑣碎的角色，我們將看到民族國家和族群語言團體，如何在新興的超民族主義重建全球的過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國的世界體系中」（Hobsbawm 1990：182）。也許，是我們自己在期望著人有更大的創造力來創造出新的政治體制，以解決我們所身處時代的困境。

擅長當代文化形式之研究的鄭瑋寧女士，提出了許多有關如何進一步思考及研究書中涉及的當代現象與問題，我大體都同意，但我對於她和謝國雄共同深切關懷的存有問題有所保留，在此做一些說明。正如他們所說，本書第三卷到處充滿著「存有」的現象，以至於謝國雄提出一套如何建立及證明另一個層次的實在之實證論方法。然而，正是在這一卷書中，我們也同時看到人有著多重的自我，隨著情境不同而不斷改變自我。這全然不同於西方過去基於個人的獨立自主性以及個體與社會或國家的對立是全然不同，如此一來，我們還可將此逕稱之為「存有」？對此我相當保留。另一方面，腦神經心理學家 Joseph LeDoux（2002）已證實每個自我並不是單一一致的，而是個生理上、生物上、

心理上、社會上、文化上，內在有許多不一致的單一合體（union）。由此觀之，所謂一致且自成一格的自我或人觀，乃是文化與時代的產物。那麼，在當代的發展提供人更大的自由空間後，是否反而讓我們得以回歸到人原本就不一致、缺乏整體統一的自我本性？由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深刻影響我們對於許多當代現象的理解與解釋，因而成為我們研究這個新時代無可避免要面對的重要課題。譬如，如果在當代，我們並沒有一致而自成一格的自我或人觀，那麼西方文化的「存有」問題，是否仍然存在？或者，那根本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承認，在沒有對當地當代得到一個整體圖像的掌握前，很難用實證論的分析方法來加以證明。若前提有問題，論證結果仍是錯的。換言之，至少在還沒理解當地人當代的多元人觀前，我們很難確定「存有」對於當地人的真確意義。

同樣地，鄭瑋寧提到的意象問題，確實是有待釐清的大問題。對這個正在浮現而未來有可能取代文化的概念，我們雖可用鄭瑋寧所提的實證分析方式分辨出意象的不同類別及內涵，但很可能會因而落入 Edmund Leach（1961）所批評「收集蝴蝶標本」的陷阱，而難以自拔。事實上，依 Claudia Strauss（2006）的意見，目前有關意象或想像的討論，理論上不外乎 Cornelius Castoriadis、Jacques Lacan、以及 Benedict Anderson 與 Charles Taylor 等三個不同傳統。若我們不能以個體為中心來探討當代的現象，固然就失去以意象或想像取代文化概念的意義，但這類概念若無法讓我們同時掌握到時代意義及文化的獨特性，同樣會失去它具有的集體性。這正說明這個課題目前發展上的複雜性與困難：因它不僅涉及上述幾個不同的學術傳統如何連結與如何超越個體與集體的對立，也直接涉及當代網際網路背後觀看世界的方式，更涉及了繪畫、攝影、電影等的 picture theory，以及心理學的認知理論與夢的解析這類心理分析知識等。換言之，如何面對當代新現象的複雜性，更需有一套新知識來掌握，而這早已超越了過去以經驗論科學觀為主的知識系統。是以，它實涉及新時代的新知識是如何建構的大問題。

此處也涉及了全書中比較困難說明的部分，亦即「透過歷史過程的比較及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圖像的對照來論述」。顯然，我在書中並未清楚說明「全人類社會文化整體圖像」的內涵，但事實上也不可能，因它至少需要以另一本書的篇幅才能清楚說明。同樣，我往往沒有直接比較同一現象在不同時期的個別意義。但讀者若能意識到筆者不斷強調歷史化、脈絡化、及比較的立場與觀點，就不難掌握同一制度的意義之延續與改變。譬如，謝國雄所批評的排球賽，實源自傳統時期儀式終結時，以酒宴滿足所有參與者而達到 *sinpakanasikal* 大家都滿意的境界。到了現代化時期，教會反對喝酒而以打排球來取代；到了當代，在新時代脈絡下才有新規則的排球賽出現。當然，我承認有些地方是

我未能清楚闡釋。更重要的，若讀者欠缺這樣的能力，將難以掌握 Robert Hertz 的 *Death and the Right Hand* (1960) 這類表面看似無關比較、實際上作者心中卻是以西方葬禮為對比，來研究婆羅洲二次葬的經典著作，甚至我們更不能忽略人類學民族誌自從 Edmund Leach (1954) 以來因帶入結構論的觀點，得以超越經驗論限制而有了新發展，否則我們將更難掌握當代如此紛繁複雜的現象。事實上，筆者在書中一再強調綜合能力比分析能力更重要，實也涉及當代新知識的性質。

至於才華橫溢、知識廣泛的人類學者林開世先生，提出了幾個大問題，我目前並沒有足夠能力回答。確實，「尋找南島民族特有的書寫文體」，以便跳出西方現代性許多二元對立的思考傳統，並「建構出符合在地文化脈絡的文類與風格，來呈現不同的價值形成與策略如何在不同地方運作」，是從事台灣南島民族研究者未來不可迴避的責任。正如亞馬遜地區的土著人類學家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1992, 2009) 所做的，以多元自然論來挑戰既有的宇宙論觀點而有新的突破，但要避免落入極端的文化相對論而忽略了當代的歷史脈絡，反而無法面對當代。至於面對「當代」這個問題，只從邊陲的研究是很難掌握新自由主義如何能夠成功的邏輯之問題，我同意在未來研究策略上確實要思考是否在金融資本集中的中心等地方從事研究的可能性。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研究邊陲仍然有其價值。正因為是邊陲，較少緊密的制度性限制反而有較大的空間可以發揮，甚至更容易尋找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譬如，柬埔寨布農人傳統人觀強調人生而不平等所導致相對能力的交換，正可緩和現代交換體系所造成貧富懸殊極端化而衍生的各種問題。正如吳叡人所說，「前文明時代的，個體未分化出來之前的共同體規範，無法在當代情境下進行機械性複製」，但面對這樣有啟發性的創造，如何使它成為當代有效的制度，不正是研究者及實踐者的責任？

至於同樣是人類學者卻非常熟悉台灣原住民族誌的陳文德先生，提出了許多跟民族誌有關的問題。其中，有關「新自由主義下的真實與虛幻模糊不分與布農社會原先本體論的特性之間有何異同」，以及當代布農人的多重人觀與傳統人觀有何異同？確實，我在第三卷並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這與上述意象及存有問題有關。一方面因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不同，即使原本性質不變，其意義也不同，更何況在新世紀，網際網路這類新科技及社會組織衰敗帶來的新自由，均讓當地人人觀及認識世界方式有所改變，使人觀及世界的本體均有別於過去，雖然當中仍有另一層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如何掌握新發展的新面貌，往往又涉及新觀念及新知識的創造。譬如，多重人觀到底是怎樣的人觀，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僅需要整合的能力，更非得需要心理分析方面的新知識不可。至少，

我必須掌握當地布農人夢的分析知識之後，才有可能回答這類民族誌的問題。

最後，不僅陳文德要問，年輕同學更常問我：初次做田野工作者究竟該如何從事當代的研究？尤其是田野經驗及民族誌知識累積不足的人，又該如何從事當代複雜現象的研究？這問題的解決一部分須仰賴我們如何創造出跨越學科界線的新知識。事實上，我在這部書中大量引用了小說創造的觀念與意象來討論。另一方面，要如何教導當代學生面對當代複雜的問題，恐怕是當代教育界刻不容緩的嚴峻課題，並非我一個人所能回答的。至少，這部書證明了未來個人除了經驗分析能力，更迫切需要的是綜合的能力。

引用書目

Hertz, Robert

1960 *Death and Right Hand*. Glencoe: The Free Press.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and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ach, Edmund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1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LeDoux, Joseph

2002 *Synaptic Self: How Our Brains Become Who We Are*. New York: Penguin Viking.

Strauss, Claudia

2006 *The Imaginar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6(3): 322-344.
DOI:10.1177/1463499606066891.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

1992 *From the Enemy's Point of View: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an Amazonian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考古人類學刊・第 78 期・頁 207-212・2013

2009 The Gift and the Given: Three Nano-essays on Kinship and Magic. In *Kinship and Beyond: The Genealogical Model Reconsidered*. S. Bamford and J. Leach, eds. Pp. 237-268. Oxford: Berghahn Books.